

从雪夜取蔡州到杯酒释兵权

●张剑锋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十一日凌晨,狂风卷着暴雪在淮西土地上肆虐,蔡州城里的人们都在温暖的被窝里沉浸于梦中,全然不觉隐隐夹杂在风雪声中的几声鹅鸭叫声和比这更为微弱的脚步与马蹄声。而与此同时,在城外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黑压压的9000唐军正在悄无声息地向城垣逼近。有几个唐军还在用枪杆击打城边鹅鸭池中的鹅鸭,用鹅鸭的叫声掩盖唐军行军的声音。然而唐军很可能是多虑了。事实上,上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下至一个个普通兵士,整个叛乱多年的淮西军都做梦也没有想到,已有30多年未曾看到过蔡州城的官军能够在唐邓随节度使李愬指挥下一夜之间冒着暴风雪奔袭130里,插翅飞到蔡州城下!剩下的一切都很简单,唐军在淮西军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连破蔡州外城、内城。直到唐军冲到吴元济的外宅墙外,吴元济还在床上以为是俘囚作乱或是洄曲守军的子弟索求寒衣呢。于是,吴节度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李节度使的阶下囚。

是的,这就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李愬雪夜取蔡州的故事。在当时看来,这确实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一举解决了劳师糜饷3年之久,一度让朝廷几乎要放弃整个平藩政策的淮西战争,而且对其他桀骜不驯的藩镇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吴元济就擒后不久,曾经横行不法的横海节度使程权、幽州节度使刘总、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宣武节度使韩弘等人纷纷上表献地,请求归顺或入朝。只剩下一个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还敢顽抗两下,结果仅7个月就被官军平定。这样,从元和十二年十月,到元和十四年二月,仅仅17个月时间,所有的藩镇就几乎都向朝廷表示顺服。从六十

多年前的安史之乱以来唐王朝四分五裂的藩镇割据局面似乎就此终结,国家重新实现统一,史称“元和中兴”,唐宪宗也因此与唐太宗、唐玄宗一起,被后人称为唐代最有作为的3个皇帝。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那个蔡州城外的风雪之夜!

然而,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得稍微长远一点,就会发现这次伟大的胜利原来竟是如此的浮云!在雪夜取蔡州的28个月之后,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李纯驾崩,唐穆宗李恒即位。而就在第二年(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卢龙、成德、魏博等河北三镇就再次反叛,重新恢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愈演愈烈。又过了86年,唐哀帝天佑四年(907),曾经的唐朝宣武等军节度使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唐朝终于灭亡在藩镇手中。

雪夜取蔡州的辉煌之所以会最终落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唐王朝没有看到藩镇割据问题的本质——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藩镇割据,不是因为凑巧朝廷选了一批贼骨头来当节度使,而是因为节度使权力太大,而中央的实力又太弱!节度使制度是唐玄宗时代逐渐成形的。这一职务位高权重,地位几乎与宰相相当,常有节度使入朝为相或是宰相出镇为节度使的情况,以至于被人称为“使相”。节度使的权力之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军权重。唐朝精锐部队尽在节度使掌握之下。天宝年间,边镇的十个藩镇拥兵50万,其中仅安禄山就兼领3镇节度使,拥兵20万,而中央的军队仅8万。而且这些军队均为常备募兵,统兵、调兵、用兵三权均由节度使掌握,几乎与私兵无异。

二是军政财三权合一。节度使们不仅仅是地方军事统帅,而且还照例兼任采访使(后改称观察处置使,为地方行政长官)、支度营田使(管理军费财政),军政财三权合一,完全是独立王国的气派。

三是兼领支郡。节度使除管理本州府外,还统领少则几州多则十几州的其他州府,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实权就得到几倍十几倍的扩大,敢于和朝廷分庭抗礼也就不奇怪了。

正是有了上面这些大权在握,节度使们具有了与朝廷分庭抗礼,乃至取而代之的资本。有了这样的资本之后,最终是否使用当然还要看节度使们的个人道德品质。但话又说回来了,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真正能站得稳立场的又有几个人?反正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两个主要统帅中,仆固怀恩反叛,李光弼最终也选择了拥兵自重,只有郭子仪一人得以善始善终。击败魔王的英雄自己却变成了魔王,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然而,唐王朝却似乎始终没能弄明白这一点,唐朝的皇帝们一直认为叛乱只是这些反贼的个人问题,只要把他们消灭掉就好。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的这150多年的时间里,唐王朝一直在竭力平藩,但平藩的策略却是用藩镇去打藩镇,结果就是越打藩镇越多。安史之乱前,藩镇还只存在于边境,而正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朝廷在内地也设立了大量节度使用于作战,而且还给予了他们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更大的权利。此后,为了镇压这些新节度使中的桀骜不驯者,朝廷又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一个魔王倒下了,十个战胜魔王的英雄又变成了魔王,这就是唐朝平藩史的最佳概述。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平藩战争中的任何胜利,都只是

胜利者个人的胜利,而不是朝廷的胜利,更不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胜利。就像雪夜取蔡州,就只是李节度使针对吴节度使的个人胜利,至多是唐宪宗个人的胜利。胜利之后,李愬本人或许不反,但却没有任何制度来保证他的继承者们不反(恰恰相反,制度事实上是很鼓励他们反的)。唐宪宗在世时或许能够挟战胜之威,让藩镇们听话一点,但却没有任何系统来保证他死之后藩镇们也会听话。这样的胜利最终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应该是不难估计的。

最终结束藩镇割据局面的,不是李愬那样炫而又炫的军事胜利,而是一桌非常不起眼的饭局。

这场饭局发生在那个雪夜的近150年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刚刚黄袍加身才年把的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老伙计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一起开怀畅饮。当酒兴正浓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叹气道:“我能当皇帝是因为你们的拥戴。但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如今整夜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这不难知道,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石守信等大惊,顿首涕泣请求指明道路。赵匡胤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多攒点钱享受,让子孙享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去选个好地方做官,为自己和子孙置业,快乐过一生。我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彼此无猜疑,这样多好!”石守信等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高级将领纷纷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欣然同意,重臣藩镇们的兵权就这样被解除了。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到这里仿佛就结束了,但这个故事如果真的就这样结束了,那么赵匡胤也没比唐宪宗高明到哪里去,这也只不过是赵匡胤对石守信们的个人胜利,石守信们的后继者们还会继续在神州大地上演绎一出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活剧。但幸运的是,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兵权解除之后,赵匡胤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以削弱藩镇的权力。

在军权上,北宋将统兵、调兵、用兵三权分拆。负责禁军(即北宋的正规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掌管统兵权的是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这三衙相互独立,原本可以统一指挥三衙的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官职被撤销了。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而具体指挥军队作战的才是边镇将领。而且,北宋规定禁军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在军队部署上,北宋采取了“内外相维”的平衡策略,在京师军队和外地驻军之间达到平衡,以互相制约。这一系列的措施就导致北宋边镇将领的军权大大缩水,根本无力与朝廷对抗。

在行政、财政方面,北宋以文官出任各地知州、知府,管行政,在各路设文职转运使,管财政,从而取消了节度使在这些方面的权力。而且北宋下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此后节度使甚至连本州府的政事都一般不去治理了,完全成了荣誉虚职。

经过这些改革,藩镇的权力被彻底掏空了。北宋一代,再没有发生过藩镇能够与中央抗衡的事件,藩镇割据终于成为了历史(事实上,北宋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达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对宋军的战斗力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使得宋军在“外战”方面的记录一直不佳)。

不论是雪夜取蔡州还是杯酒释兵权,都是上千年前的老皇历了,但他们的经验教训,直到今天还很值得我们深思。值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当前遇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虽然说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每一个具体问题从个案上来看都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这些问题的根源常常都指向几个系统性、制度性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尚不完备、缺乏对政府的监督约束、收入分配现状不够公平、社会保

障体系不够健全、对某些市场行为的监管不到位等等。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系统性的问题必须系统性的来解决。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在应对这些问题方面,却主要采取的是雪夜取蔡州的做法——哪里有人上访,就去解决一把实际问题,哪里有人闹事,就去维一把稳。而对制度性的改革却一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应该说,作为应急措施而言,这些做法确实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诞生一批“好干部”、“信访模范”,让一批群众在电视上感激涕零一番。但是,正如雪夜取蔡州一样,这些成果与胜利,都只是这些个案和个人的成果与胜利。这种成果虽然在短时间内、在局部地区可能起到一些缓和矛盾的作用,但从长期、从全局来看,它们不仅无助于整体问题的解决,甚至还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同样的社会问题,你没有从根本上、制度上来处理,而是给甲解决他的个人问题,那么碰到同样问题的乙和丙可能就不平衡了——为什么给他解决不给我们解决?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因为他有关系?是不是因为他去闹了,而我们没有去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上访、去堵门……这样的维稳,可能最终会越维稳越不稳。

可能有人会觉得一次性解决社会制度问题的难度太大、成本太高,而花两个钱打发几个上访户明显要比这容易得多。这显然只是从短时间、局部范围内来看问题的结果。从全局、长期来看,正如唐朝历次平藩战争开支的总额远远超过北宋杯酒释兵权所发生的费用一样,一次又一次扬汤止沸的成本总量也必然会超过釜底抽薪的成本,且不论扬汤止沸其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釜底抽薪可以。目前我国被媒体称为“维稳经费”的公共安全支出已经达到每年五六千亿元的规模,不仅超过了国防预算,更远远超过了许多用于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一年是这么多钱,五年、十年、二十年又会是多少钱?如果真正下决心去解决社会的制度问题,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吗?可见,解决社会问题,我们真正缺的不是财力与条件,而是领导者的眼力与决心。■

责任编辑/史明